

## “‘加’无副词义”辨及其它

林寒生

古代汉语常用词“加”能否解释为“更、更加”，作副词用？现行某些词典中设立的副词义项“更、更加”是否必要？周复纲先生在《“加”无副词义》一文（原文载《疑难字词辨析集》，《辞书研究》编辑部编、1985 年版）中提出：（一）“加”的副词“更、更加”义项应予撤销；（二）应增设“加”的动词义项“变”，大型辞书还可以进一步考虑增设“加”的动词义项“增”和“减”。

我们认为，“加”作副词“更、更加”讲，在某些特定的语言环境中，是可以说得通的。就以《“加”无副词义》一文所提到的宋王安石《游褒禅山记》为例吧。该篇有“盖其又深，则其至又加少矣”一句。周先生在《“加”无副词义》一文中正确指出：“如所周知，当文句中用‘更加’时，必须意味着意义上存在着比较、递进关系”，而“其至又加少矣”中的“加”恰好体现了这种关系。在这句话前头，作者已提及，游历华山洞，“入之愈深，其进愈难”，“怠而愈出者”愈众；又说：“盖予所记，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，然视其左右，来而记之者已少”，所以他才得出“盖其又深，则其至又加少矣”的结论。此处“加少”，恰是紧承上文“已少”而来，其意义上之比较、递进关系已十分显豁，训“加”为“更、更加”，不是至为允当吗？周文从总体上否定“加”能作副词“更、更加”解，唯独对此一引例仅列而不议，不知是否有所踌躇、疑虑？倘依周文意见，释此处之“加”为动词义“变”（或“减”），倒是令人觉得扞格难通，与王安石原文的意思真是大相径庭了。

《“加”无副词义》一文还列举杨树达先生《词诠》（中华书局 1982 年版）一书中释“加”为“表度副词”（按：即程度副词）的五条书证，逐一驳斥，以证其非。如例：（一）：“孔子至舍，哀公馆之，闻斯言也，言加信，行加义。”（《礼记·儒行》）按周文所言，上引“言加信，行加义”，“文中并无前此哀公已有‘信’、‘义’之意，故无所谓‘更加’。”此一说法，貌似在理，其实不然。《礼记·儒行》通篇主旨在于宣扬儒者的高尚品行，又何须在哀公身上多费笔墨，称他在闻知孔子一席话前如何如何呢？而哀公“闻斯言也，言加信，行其义”，事实上已暗示出他到底是一位尊贤礼士、讲求信义的君主，否则他何至于勇于纳谏、从善如流，先是向孔子问“大礼”，再向孔子问“儒服”、“儒行”，及其了解了儒者所述的“礼”的具体内容之后，深为折服，以致发出“终没吾世，不敢以儒为戏”的感慨呢？况且前此《礼记·哀公问》对哀公向孔子请教天道时的“谦退”态度早有说明。他先是向孔子表示说：“寡人蠢愚，冥烦，子志之心也。”待孔子“蹴然辟席而对曰：‘仁人不过乎物。是故仁入之事亲也如事天。事天如事亲。是故孝子成身’”时，“公曰：寡人既闻此言也，无如后罪何？”以致孔子对他的态度也给予赞许：“君之及此言也，是臣之福也。”这说明他向孔子请教“礼”，是有诚意的，也是有一定思想基础的。因此，把“言加信，行加义”理解为“言语更加讲求信用，行为更加讲求礼义”是不成问题的。此处若将“加”训为“变”（或“增”）恐怕是无理据的。“例（三）：‘及禹为少府，比九卿，禹酷急。至晚节，事益多，而禹治加缓，而各曰平。’”（《史记·张汤传》）周文以为，“按文意，禹始而‘酷急’，此则‘加缓’。缓与急固意义对立”，故“绝不可释‘加缓’为‘更缓’”。事实上，禹治由“急”转“缓”，乃对“至晚节”而言，年稍轻者位尊势显，显得气势威壮，治事“酷急”，至年事高则血气衰退，理事渐趋老成持重（即所谓“转缓”），本

为自然规律；后文言“禹治加缓”，实针对“事益多，吏务为严峻”而言，为“至晚节”后“治缓”意之更进一步。再如例(四)：“易王母，文侯夫人也，与苏秦通。燕王知之，而事之加厚。”(《苏秦传》)此例中的“加”，情况与例(一)相类，不再赘述。

至于例(二)：“察邻国之政，无如寡人之用心者。邻国之民不加少。寡人之民不加多。何也？”(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)其中的“加”，是人们历来争议的焦点。原因是这句话中，既有“加多”，又有“加少”。“加多”，如果说是“增多”，一般人倒不至于难以接受；然而，“加少”便颇费一番脑筋了。王力先生主编的《古代汉语》在讨论这句话中的“加”时便采取了一种折中说法，释“加”为副词“更加”。这样讲表面上是通了，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。其理由正如周文所述，“不加少”与“不加多”之前并无前此“邻国之民已少”，“寡人之民已多”之意，自然更谈不上“更加”了。《辞海》(修订本)(上海辞书出版社，1979年版)对上述两处之“加”统训为“增益、更加”，而“增益”为动词，“更加”为副词，一实一虚，意义了不相涉，生拉硬扯在一块儿，显然考虑失当。事实上，“邻国之民不加少，寡人之民不加多”句中的两处“加”，还是训动词“增加”或其近义词“增进、增益”等较为妥切。问题是我们对“少”与“多”当作何理解。鄙意以为，例(二)中的“少”与“多”，不能简单地当作形容词，而是形容词转为动名词的活用。“加少”，实指增加人口的减损；“加多”，则为增进人口的发展。阮元校勘本《十三经注疏》中孙奭的《孟子注疏》正是这样处理的。孙氏以为，“邻国之民不加少，寡人之民不加多”二句应理解为“邻国之民不增益其损，寡人之民不增益其多”，此则文中两处之“加”均可训为动词“加益”，而且后头能够带“其损”、“其多”一类动名性结构作为它的宾语。“损”，“多”对举，“损”既作为动名词处理，与其意义相对的“多”自然也是动名词，此则“加多”理解为“增进发展”便是顺理成章之事了。战国时期，社会生产力低下，加上战事连连，“凶”年频仍，人民生活困苦不堪，非但谈不上安居乐业，而且还常见“涂有饿莩”，以致人口、劳动力的匮乏便往往成为困扰统治者的突出社会问题，并经常迫使各诸侯国最高统治者不得不采取一些移民、移粟一类恢复生产、重视劳动力役使等等的保民措施，以便“夺民”；一些自诩为治国“尽心”的君主如梁惠王等也才会有“河内凶，则移其民于河东，移其粟于河内；河内凶亦然”这样的明智举动。然而，在孟子眼中看来，梁惠王所采取的这类保民措施，与邻国之君比较，虽说显得较为“用心”，但它只是一种临时性补救行为，无助于问题的根本解决，因此收效甚微；所以他才有意识地让梁惠王发出“邻国的百姓没有增加其损失，我国百姓(的人口)也没有增进其发展”的慨叹，好引君入彀，为下文推销自己的仁政、王道的政治主张张本。这样理解问题，该不至于有所窒碍吧。至于《词诠》所引之例(五)：“朕亲率天下农，十年于今，而野不加辟”(《汉书·文帝纪》)，“野不加辟”之“加”，训为“增加”，作动词解。似也比较作副词“更加”合理。理由同上条。原文意思较明显，此不另辨。而《词诠》将其并入“表度副词”，则非是。

由上可知，古代汉语中的“加”，既有副词“更、更加”义，又有动词“增加”等义(自然还不止这些)。至于多义词“加”在何种情况下训为副词“更、更加”或动词“增加”等，还是其他别的什么意义，当视具体情况而定，不可一概而论。《辞海》(修订本)将“加”的动词义“增加”与副词义“更加”并入一同义项固不可取，而《辞源》(修订本)(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)与杨伯峻先生《孟子词典》(见《孟子译注》，中华书局1960年版)竟然摒弃“加”的“更、更加”义的“决断”也未必正确。周复纲先生对古代汉语个别文句中的“加”误译为“更、更加”提出异议，值得重视；但他却从此出发，进而全盘否定古汉语语词“加”在某些特定场合确有副词“更、更加”义，又似乎令人感到有以偏概全之嫌。至于他提出当为“加”设立一动词义项“变”(下转第96页)

今按:先秦古籍,“故”字可用作提示之词,同“夫”。(详裴学海《古书虚字集释》卷五“故、固、顾、姑”条下。)《荀子》一书,“故”字的这一用法很常见。如《非相》篇:“故相形不如论心,论心不如择术。”《儒效》篇:“故有俗人者,有俗儒者,有雅儒者,有大儒者:不学问,无正义,以富利为隆,是俗人者也。……是俗儒者也。……是雅儒者也。……是大儒者也。”《王霸》篇:“故用国者,义立而王,信立而霸,权谋立而亡。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,仁人之所务白也,……是所谓义立而王也。……是所谓信立而霸也。……是无他故焉,唯其不由礼义而由权谋也。”等等,句首的“故”都是提示之词而非因果连词。上引《非相》文:“辨莫大于分,分莫大于礼,礼莫大于圣王。圣王有百,吾孰法焉?……”,其下文“欲观圣王之迹”云云是答词,而“文久而息,节族久而绝,守法数之有司极礼而褫”三句却非答词,它只是对下文的所答先来一点提示性的议论,所以前面的“故”字是提示之词而非衍字,“故”后面的“曰”才是衍字。

又,《王霸》篇:“故一朝之日也,一日之人也,然而厌焉有千岁之国何也?曰:援夫千岁之信法以持之也,安与夫千岁之信士为之也。”王念孙《读书杂志》又说:“‘故’字涉上下文而衍。‘一朝之日’云云是问词,则不当有‘故’字明矣。”《群书治要》无“故”字。”今按:此处的“故”,也是提示之词,王念孙认为它是衍文,实为误说。如果把“故”视为因果连词,那么,在这个问句中“故”字确实不应该有,但如果把它看作提示之词,那就有用它的必要了。

(作者单位: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;邮编:510275)(责任编辑:江红)

(上接第94页)(变化、变更),使其能同时包含有“增”与“减”两种含义的建议也未必可行。他以古籍文献中的反训现象为类比,把其与“美恶同辞”“施受同辞”之类的反训词列为同一型式。我们以为,此一意见更难苟同。在我们看来,说“加”含有“增、减”两义,非但缺乏文献证据,而且连“加”本身是否能引申为“变”均成问题。按“加”,《说文》:“语相增加也。”其义偏于数量增多;而“变”,《说文》:“更也。”其义偏于“变更、变化。”“加”作动词时,动作涉及甲乙双方,是一方对于另一方的;而“变”的动作则从客体自身而言,一般不涉及他方的。它们之间义不相涉,难以交互引申。古籍文献也未见过由“加”引申为“变”的实例。因此,凭空为“加”另设一动词义项“变”,非但多余,且无根据。

(作者单位:厦门大学中文系;邮编:361005)(责任编辑:江红)

## 书 讯

《古代汉语》(上下册),32开,906.5千字,荆贵生主编,黄河出版社1995年8月出版。定价(上下册):35.80元。

《实用文言词典》,32开本,12万字,何九盈、李学敏编著,广东教育出版社1994年7月出版。定价:平装21.00元,精装28.50元。